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 过渡型社区的空间“聚—离”与包容性治理<sup>\*</sup>

吴宗友 丁京

**摘要:**在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我国出现了大量“亦城亦乡”的过渡型社区,其“过渡性”带来了多维空间的“聚—离”张力,主要表现为:“迁村腾地”的空间聚合与社区认同的空间疏离;“摇号分房”的聚居正义与社会空间的区隔离析;生产空间的集聚与消费空间的离散;生活空间的内聚与文化空间的斥离。针对此类社区的特殊矛盾,实施包容性治理,即开展以主体包容、制度包容、技术包容与文化包容等为主要内容的理念与实践创新,可以显著地消弭过渡型社区的空间张力,有效地促进社区权力空间、制度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文化空间的深度再造,进而实现过渡型社区“善治”的理想图景。

**关键词:**过渡型社区;空间张力;空间重组;包容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6-0062-09

社区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sup>①</sup>我国许多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催生一种全新的社区形态——过渡型社区。伴随着土地转让征收、村庄拆迁重组等空间聚合的推进,过渡型社区中的居民主体即失地农民普遍性地面临城乡物理空间(即地理空间)变迁、社会空间区隔、生产空间分异、文化空间离析等多维度的分离性空间张力(或曰冲突)。这种特殊的“聚—离”悖论持续性地影响着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优化升级。如何因应此类社区顺利转型之需,帮助失地农民高质量地实现市民化转型,是值得学界深入探究的时代课题。本文选取了安徽省合肥市市区与C县交界处的L社区为田野点,着重探究过渡型社区“聚—离”张力的发生机制,并以“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发展理念为指导,全面审视包容性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以期推动过渡型社区走向善治,为类似地区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 一、空间社会学理论视域下的过渡型社区治理

究竟何种类型的社区才能归类为过渡型社区,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缺乏统一认识。从居住模式的改变来看,喻新安认为过渡型社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然村或行政村经由征地拆迁后集中安置而形成的一类社区。<sup>②</sup>从管理体制来看,纪芳强调,过渡型社区是以改变原行政村或中心村村委会为农村社区居委会的自治组织;此外,也有部分过渡型社区实行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双自治组织共存。<sup>③</sup>从建设类型来看,徐宏宇将过渡型社区分为五种类型:一是城镇社区(集镇社区);二是城乡接合部社区;三是“城中村”社区;四是“村改居”社区;五是拆迁安置社区。<sup>④</sup>

本文所研究的过渡型社区是指在整村推进式城镇化过程中将原有两个及以上自然村或行政村进行拆迁合并,土地被征收或被集中流转,失地农民在规定时间内被集中迁入统一规划的新建楼宇,居住空

收稿日期:2022-03-12

<sup>\*</sup>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研究”(21ZDA057);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人民政府招标项目“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研究”(2019FCFN0398)。

作者简介:吴宗友,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合肥 230601)。

丁京,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生(合肥 230601)。

间发生了结构性重组等基础上,最终形成的新社会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理想状态应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以及心理空间在人们朝夕相处的社会生活基础上的有机融合。现实情况则是:过渡型社区的居民主体在失去土地后,其主要生产活动在较短时间内转向非农产业,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他们的生活世界在政府的引导下迅速转向所谓的“市民社会”;同时,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与其居住空间(物理空间)聚合相悖的其他空间关系的严重疏离现象,这是乡村文化和都市文明在短时间内激烈交汇的必然结果,并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方式、社区文化、社区认同等一系列的冲突性张力。正是基于这样的特定情境,遂将此类居住共同体称为过渡型社区;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此类社区的治理问题也成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诚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sup>⑤</sup>这一论断符合“重回生活世界”的方法论原则与价值立场,超越了实证社会学所坚持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为对日益呈现流动性、碎片化与多元化社会基本样态的回应,以空间性为价值基准的认知判断体系逐渐形成。融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为一体的“三元辩证法”逐渐成为认识和分析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复杂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作为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上重要成就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提出原创性的空间理论之后,国际社会学研究开始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逐渐成为分析社会问题的崭新视角和概念工具。

梳理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脉络,就其要点而言,列斐伏尔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作为逻辑起点,以都市化进程中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在生产语境中深刻把握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辩证关系,开创了日常生活异化与现代化的空间生产理论。<sup>⑥</sup>戴维·哈维则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揭示空间与资本循环的内在关联,提出“空间正义”这一重要概念。<sup>⑦</sup>爱德华·W. 苏贾将空间社会学称为后现代地理学,并建构“第三空间”的概念工具。<sup>⑧</sup>此外,福柯、吉登斯、曼纽尔·卡斯特等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空间视角,缔造了各有异趣的“空间理论王国”。仔细品味空间视角下的诸多社会(学)理论,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社会与空间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互动

机制。一方面,空间是由社会塑造的,是社会关系的容器,人类的社会实践和技术创新塑造了不同特色的空间样态(包括网络空间);另一方面,空间能够以自身独特的存在和独有的方式模塑个体的意识形态,进而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承载者”。

就本文所研究的过渡型社区空间而言,快速的城镇化推动过渡型社区由传统“乡村空间”向现代“都市空间”不断转型,而失地农民作为适应空间转型的主体,因短时间内社会适应能力相对不足,心理空间与都市文明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张力,加之包括网络空间在内的流动空间深度嵌入在地化空间,导致置身于过渡型社区的居民始终无法达到“时间性”“空间性”“社会性”彼此互构、和谐一体的稳定状态。<sup>⑨</sup>循此思之,笔者认为空间社会学理论为过渡型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角,不仅为思考失地农民市民化受阻的深层原因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推动过渡型社区走向善治提供了关于“空间公平与空间正义”的策略性思路。

## 二、过渡型社区的空间“聚—离”张力

在传统的基层治理架构下,过渡型社区面临一系列的治理难题。本文选取安徽省合肥市L社区作为田野点,展开深入的参与式调查,以期深度把握过渡型社区的各种空间张力和矛盾,为有针对性地展开较高质量的治理实践提供基于现实的理论依据。L社区属于C县S镇的一个同名行政村,总面积991.16公顷,辖区内有24个村民组、28个自然村庄、798户、3293人,原有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耕地面积6000亩。<sup>⑩</sup>L村于2009年向政府申报“整村推进城镇化”项目,并于2011年12月经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财政厅批准实施。项目共分为两个阶段:一期土地整理及旧村搬迁复垦;二期新村建设。新村总建筑面积73344.94平方米,其中住宅70176.8平方米,公共建筑3168.14平方米。<sup>⑪</sup>伴随着S镇各项建设的城镇化升级,2017年2月C县民政局正式批复撤销S镇L村村民委员会,并将其改设为居民委员会。在此过程中,居民居住空间的重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引发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矛盾和冲突,导致L社区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2021年7月至10月,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就社区治理问题对L社区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同时,

运用半结构化访谈、体验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多次深入该社区调研过渡型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难题——空间张力,进一步分析浮于空间聚合的现象表面之下,隐而涌动的令居民难安、让领导头痛的空间离析力量。调研中涉及的访谈对象主要有在行政

上分管 L 社区的镇政府领导、L 社区居委会有关工作人员及负责人、社区能人、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社区工作者、社区普通居民以及物业公司负责人等,访谈人数超过 3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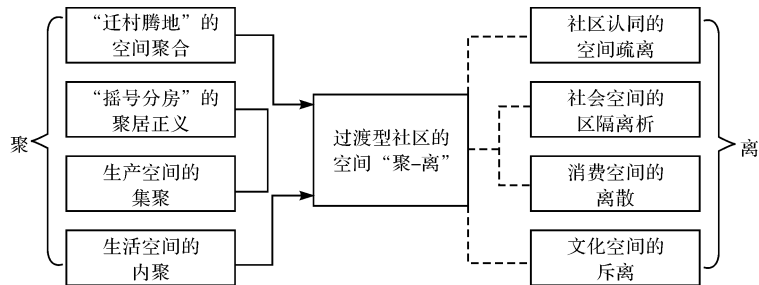


图 1 过渡型社区的空间张力示意图

### 1.“迁村腾地”的空间聚合与社区认同的空间疏离

列斐伏尔在“空间实践—表征空间—空间表征”的三元空间辩证法中提出物理空间是“空间实践”的基础,暗含着“绝对空间”的隐喻。<sup>⑫</sup>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实践经验表明,人们一切社会行动归根结底必须以物理空间为基本条件,而当物理空间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并经由市场逐渐商品化的时候,物理空间就获得了(或曰叠加了)多重非物理性的空间内涵,由单纯的物理空间逐渐转化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认知以及社会权利的空间载体。就 L 社区居民近年来的空间变迁和空间实践而言,在“迁村腾地”的城市化过程中,就典型地呈现了物理空间聚合重组的同时空间认同以及社会空间(社区共同体)难以凝聚的“聚—离”现象,鲜活地演绎了多重空间关系以物理空间为基础而产生叠加效应的复杂过程。伴随大规模的“迁村腾地”式空间重组行动——土地被征收或流转、村庄被拆迁,28 个自然村、798 户被整合进数十栋居民楼内,L 村村民“洗脚上楼”集中居住在新建的回迁社区,新的生活空间成为亦城亦乡、社区居民身兼村民与市民双重身份的“过渡型社区”,村民的日常活动范围也被骤然缩减到边界明晰、空间范围有限的社区“新空间”内。这种运动式“迁村腾地”使原先经由很长时间自然形成的村落居住格局、熟人关系、公共空间(凝聚和承载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的空间载体,诸如祠堂、庙宇等)被迅速解构或消除;而居住环境的城市化给村民带来的既有欣喜,也有基于空间功能与意义转换造成的精神世界的支离破碎,并集中体现在

对新空间的心理认同上。这种基于物理空间聚合与精神空间疏离而产生的张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因居住空间的剧烈变革而导致的“身”“心”失调。我国传统村落的居住空间是基于当地历史、风俗、习惯、道德、规则等多种条件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不仅是农民躲避寒暑风雨的居身之所,也是其日常生活的精神栖息地。<sup>⑬</sup>在基于历史性形成的村落里,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空间和谐地叠合在一起,人们的居住空间具有社会认同的文化基础,居民身处其中容易产生精神归属感,即所谓的“乡愁”。而运动式的“迁村腾地”,虽然在短时间内为村民营造干净、整洁、美观的社区环境和立体化、封闭式的单元楼,但由于其空间利用呈现出与居民传统生活、生产方式骤然断裂的新属性,使居民产生焦虑感和游离感,并导致原有村落空间所承载的人文基础和社会关系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因此,居民很难在短期内建立对新社区空间的精神认同。<sup>⑭</sup>

二是与空间聚合相伴而生的空间“规训”造成的居民对新空间的疏离感。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全景敞视主义”的行为规训理论<sup>⑮</sup>,对人们理解空间中蕴含的权力关系以深刻的启发。L 社区在政府主导的新空间整体规划设计以及建设中,根据居民入住后的社区管理需要,在空间出行、公共活动、私人行为方式、社区环境、公共安全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空间规则设定,确保在有限空间内人口密集的社区能够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在新的 L 社区空间内,每个居民都不可能像以往乡村里单门独院居住那样随意而行,而被空间聚合下的“规训”约束着依规而动。因此,他们在



享受现代化居住条件的同时反而感觉“不自由”了,甚至产生被“监视”的受控感,并在社会心理维度上产生一种对新空间的认同张力。目前,L社区一期总体规划占地491.7亩,建设安置房为28幢496套多层框架公寓楼房以及部分公共设施,以社区服务中心为中轴,分南北两个生活区;社区的出行通道仅有1个,东侧连接着合水路,南侧则为商合杭高铁轨道。按照现代城市社区封闭式管理方式,L社区四周统一建有1.5米高的围栏。除上班、购物、娱乐外,居民的日常社区活动空间较之以往可谓大范围缩减;四周建造的围栏在维护居民安全的同时,也发挥着“全景敞视主义”的空间“规训”作用。<sup>⑩</sup>

## 2.“摇号分房”的聚居正义与社会空间的区隔离析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容器”,空间是通过社会实践产生并定义的,因此,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sup>⑪</sup>对于L社区的居民而言,他们因“迁村腾地”而离开来自建的农家庭院,都希望能够入住采光、视野和周边环境符合自己需要的所谓“上风上水”的好房子。如何让每一个拆迁家庭欣然接受客观上存在居住环境差异的新居,是一个无法通过道德自觉而实现平和分配的难题,于是“摇号分房”(即在乒乓球上标记房屋号码,居民通过摇号来决定自己的具体住宅)就被确定为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分配正义(即人人享有公平选择房号的机会)。这种分配办法尽管是将所谓的公平付诸偶然性,但是各自凭借运气而摇到的房号能让彼此“没话说”。“摇号分房”确实减少了因争夺数量有限的优质房源而滋生的矛盾,不过,这种聚居正义也在客观上造成新社区社会空间的区隔离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交往被“摇号分房”之后的物理空间所阻隔。在经由一定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传统村落,村民日常交往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即以特定的实体空间为场域的空间性社会关系)往往与居住的物理空间相互叠合,邻里既是聚居的物理空间也是互动的社会空间。一般而言,社会空间不仅承载着居民的社区情感、集体记忆和社会互动,更体现了居民个人社会资源的存量和质量。因此,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往往聚族而居;在现代社区中,人们则倾向于择“善”而邻。而“摇号分房”所形成的所谓空间正义打破了居民原属各个自然村的社

会空间。也就是说,在由28个自然村骤然聚合而成的新社区里,物理空间压缩导致传统意义上对村民而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环境不再,来自不同村落的陌生人、半陌生人被随机重组为邻,带来与物理空间聚合不相一致的社会区隔和离析化的问题。新的左邻右舍之间在较短时间之内难以形成彼此信任的社会关系;相反,因为缺少亲情与熟悉关系的缓冲作用,陌生的邻居之间还容易因为争夺有限的空间资源而相互产生敌意。曾经守望相助的社会空间被新的物理空间所阻隔,原来村落里熟悉、亲密的邻里关系开始趋于淡漠化、疏离化。居民对新社区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情感排斥与心理隔膜,不利于社区认同和整合,社区归属感也因此迟迟难以建立。<sup>⑫</sup>

二是权力空间的“零和博弈”。权力是“一种受集体组织内部系统约束与控制的普遍化能力”,它具有保证社会秩序按照既定规律运转的作用。<sup>⑬</sup>构成L社区的28个自然村原属三个行政村,存在“三大宗族”,即重组前孙巷行政村的孙姓宗族、曹岗行政村的曹姓宗族以及小田行政村的叶姓宗族。“三大宗族”在长时期人情交往互惠中,形成了基于宗族关系的社会圈层结构,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差序格局”<sup>⑭</sup>。宗族之内虽以自我为圈层圆心划分出远近不同的亲疏关系,但是同族之人对他姓宗族则表现为相对一致的社会行动。尤其在L社区村“两委”等权力空间的支配上,三大姓之间的角力非常明显,都要力争“自己人”进入村“两委”。在L社区新的权力空间重组过程中,宗族势力的暗流涌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以及社区公共服务出现“零和博弈”的局面,导致基于社区认同的主体意识难以确立,公权力受到严重挑战,使镇政府委派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治理中举步维艰。社会空间的区隔在此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调研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物理空间的聚合与社会空间的离析突兀地横亘在此类过渡型社区中。<sup>⑮</sup>

## 3.生产空间的集聚与消费空间的离散

生产空间是指生产要素与生产活动相结合的场域。L社区的居民在传统农业时代,其生产空间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典型的自足性与封闭性。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是农民以承包的土地作为最主要的空间性劳动资源,以家庭为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进行的生产空间分散化的生产活动。当前,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信

息化的快速推进,利益驱动的“资本下乡”正在不断加速农民的生产流动、社会阶层分化和生产空间的大规模重组,使得 L 社区居民较之以往面临生产空间集聚与消费空间离散的空间张力。

一是生产空间由分散走向集聚。在地方政府实施的整村推进式城镇化进程中,大量村庄被连根拔起,土地被征收或集中流转,L 社区居民的生产空间完全“非农化”。对于 L 社区居民而言,原先包产到户而拥有使用权的田地或被“商品化”地开发为其他空间产品(比如商品房),或被整合为连片的土地交由市场资本进行产业化经营。以往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居民,现在无田可耕,只能通过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在新的集聚性的生产空间(比如工厂)进行集约化劳动。<sup>②</sup>

二是消费空间的离散化。在合村并居空间重组之后,随着物理空间的改变,处于市民化转型过程中的 L 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消费空间以及消费行为的多元化。由于基于传统村落的乡村集市不再,以其为中心的购物、餐饮以及娱乐等场所也随之从居民生活世界逐渐消失,但是新社区周边满足生活消费以及社会交往活动需求的配套设施还在建设中,商家和各类社会服务机构入驻更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所以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服务的消费不得不转向二三十公里之外甚至更远的现代化都市商业区。居民根据各自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偏好选择不同的消费空间,而不再如以往那样集中于乡村集市;他们的消费空间开始离散,消费方式也随之发生分异。特别是在都市消费文化的引领下,过渡型的 L 社区中较为年轻的居民由原来追求商品使用价值的实用消费迅速转向关注商品社会与文化意义的符号消费。而且,都市休闲文化消费开始在年轻村民中间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新时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选择个性化的消费空间以彰显自己在都市中的存在。<sup>③</sup>

值得关注的是,L 社区居民在由失地农民向市民身份转换的过程中,与消费空间的转换相应的是消费价值观的嬗变,他们开始注重消费环境、消费产品以及消费行为的象征意义。但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也有少部分居民在此过程中发生价值观念的扭曲,导致其新的消费空间异化和日常生活世界的断裂。譬如一些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失地农民在获得

征地拆迁补偿款后,滋生不劳而获的心理,热衷于放高利贷、开办地下赌场等不法行为,甚至染上恶习。这些情况反映了在此类过渡型社区开展移风易俗的文化空间建设的迫切性。

#### 4. 生活空间的内聚与文化空间的斥离

对于 L 社区居民而言,此处的生活空间是指居民日常生活的活动范围。文化空间则指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对其身份转变的态度、认知与行为模式,以及共享的价值体系和风土人情等。生活空间是日常的、感性的、物质化的,相对而言文化空间则是历史性的、理性的、精神化的。大规模撤村并居往往使失地农民从人均占有物理空间十分宽裕的传统村落,“空间移民”至人均享有物理空间十分有限的楼宇社区中,这必然造成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内聚式压缩,即他们的居住空间和日常活动范围较之以往显得格外逼仄。而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大部分失地农民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如此迅速的“空间切换”所形成的文化规则。众所周知,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分别拥有差异显著的文化空间,而两种文化空间的规则往往是冲突的。因为短时间的剧烈空间重组即所谓的“洗脚上楼”,会导致过渡型社区内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发生激烈碰撞,在生活空间内聚的同时,呈现出文化空间的斥离。笔者调研发现,上述情况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是生活惯习的文化冲突。就 L 社区而言,失地农民“洗脚上楼”后,原有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小农生活惯习依然坚韧地存在于居民日常生活中,与强调公共性的现代都市社区治理发生严重冲突,造成“文化堕距”现象,比如在小区公共景观的人工湖里洗衣服、在单元楼门口的公共空间堆放个人杂物、在公共草坪上种菜、在社区绿植上晾晒衣物。这些有悖于都市社区公德的行为皆是传统乡村生活中行为惯习在都市化社区中的自然显现,行为主体并未觉得不妥,也无道德自责感。笔者在对 L 社区居民关于文化空间斥离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有 41.7% 的居民认为自己虽然住在都市化的楼房和小区里,但仍然保持着农村生活方式,并认为自己还是“乡下人”;另有 7% 的居民表示对自己的身份说不清,如果非得认定的话,那就认为自己是“住在大城市的乡下人”。

二是代际关系的空间张力。整体而言,因居住空间重组而导致的代际关系紧张在 L 社区比较常

见。在L村整体拆村并居之前,农民自建的平房及庭院占有的居住空间相对比较大,房子以堂屋为中心,两侧均有多间卧室以及厢房,父母与子女居住的房间以堂屋这一公共空间分隔开来,代际关系一般不会因物理空间而产生张力。但是,自住进L社区的楼房里,子代和父代共处于空间有限的都市化住宅里,以堂屋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变为狭小的客厅,而且L社区住房只设计了一个公共卫生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中孩子未成年的话,那么家庭代际之间一般不会因为空间而产生矛盾;如果孩子处于适婚年龄或已结婚成家,那么往往会因家庭物理空间的不足而在代际之间引发不和谐的张力。<sup>②4</sup>

### 三、包容性治理:消弭过渡型社区的空间张力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人们仍然倡导以“和”为贵、有容乃大、包容处事、宽容待人等主流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sup>②5</sup>。这个重要论述蕴含着包容性治理的理念与策略。基于习近平总书记社会治理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针对空间重组后“亦城亦乡”的过渡型社区“聚—离”悖论,应采取一种包容性治理来整合社区各种空间关系,以消弭空间张力,促进发展。L社区在有关专家的参与下,通过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过渡型社区包容性治理的策略与经验。

#### 1.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主体包容策略

主体包容强调过渡型社区治理要打破过去由政府包揽一切的一元化社会管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在党建引领下,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社会组织为重要支持力量,积极吸纳民众、社会工作者、专家学者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以避免社区权力空间的异化与失衡。在实践中,要筑牢社区党建堡垒,引领社区权力空间重建,营造睦邻友善的社会空间,激活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

第一,明确社区基层党组织是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主心骨,是凝聚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者,是保障社区治理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力量。L社区通过打造“社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楼栋长”的党建引领下的三级网格治理模式,着力营建睦邻

友善的社会空间。例如,L社区按照“区域相邻、规模相当、管理方便”的原则,以楼栋为单位,将社区划分为28个网格党小组,把社区所有党员吸纳到各网格党小组中;由社区书记担任一级网格长,负责监督,指导社区综合事务;各楼栋设有由党员担任的网格党小组和楼栋长,负责发现并解决社区日常运行中的“热点”问题(如政策法规宣传、便民事务代办、居民矛盾纠纷化解),及时将过渡型社区存在的隐性矛盾予以化解和妥善处理,用热心服务激发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消除社会区隔,凝聚社区共识,增进社区认同和社区归属感。

第二,L社区坚持在党建引领下“内育外引”社区社会组织,并以之作为重要依托,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活力,做好社会服务。在“内育”方面,L社区培育了夕阳红艺术团、为老服务协会、家庭服务协会等社区社会组织;在“外引”方面,2021年7月,L社区引进合肥市SC公益机构参与社区治理,该机构是一家在合肥市民政局注册登记的5A级枢纽型社会组织。目前SC公益机构在L社区积极打造“和美公益”社区服务品牌,孵化各类具有辖区特色、满足社区需求的社区社会组织。通过这些社区社会组织,成功地将社区民意予以引导、凝聚并转换为社区服务的具体项目,为社区居民提供“点菜式”服务,满足居民的社区需求,进而巧妙地将居民直接或间接地纳入社区治理主体中。

#### 2.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制度包容策略

所谓制度包容就是在过渡型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制度优化,拓宽社区治理的制度空间,让多方参与、协商共治具有充分的制度保障,确保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顺利实现。在实践中,要畅通社区参与渠道,扩展协商治理的制度空间,夯实治理有效的社会基础。L社区是经由合村并居而形成的一类特殊社区,矛盾较为错综复杂,社区管理一开始采用的是简单化的行政手段,缺乏基于社区特殊性的制度设计,结果造成居民参与社区各项事务的热情严重不足、社区矛盾有增无减、治理无效等乱象。有鉴于此,L社区转变治理思路,多次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充分听取民意,适时建立多元共治的相关制度。

第一,在辖区内设置普通居民社区参与的各类“议”站,包括党群服务中心的“协商议事厅”、以小区凉亭为空间的“议事亭”、物业办公室的社区治理



“意见箱”等,通过多种渠道听民声、汇民心、集民智,在制度设计和服务机制上尽可能地实现最大限度的协商治理。L 社区在服务大厅每个窗口的工作人员卡座名片上,都印有“眼睛往下看、身子往下沉、劲头往下使”的为民服务理念,这也是社区服务的制度要求。

第二,进一步拓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范围和层次,畅通参与渠道。L 社区通过居民代表大会、楼栋论坛等多种形式让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在定期召开的居民代表大会上,L 社区发放社区服务需求季度清单表,让居民来监督社区服务落实情况,具体包括环境整治、治安巡逻、文化活动等方面,并按照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级来评议。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强化与居民的联系,对准居民需求,完善社区服务,夯实治理有效的社会基础。

### 3.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技术包容策略

技术包容策略的核心是面向最广泛群众的数字赋能,旨在通过开展数字治理促进新型二元社会(在场社会与缺场社会)的空间融合,以拓展居民的生产空间及其生产能力。网络社会在当下俨然已不是一种单纯的虚拟社会形态,大部分网民可通过互联网等途径表达自身在生活世界具体层面的直接感受和信念追求。<sup>②6</sup>但是,网络空间在给 L 社区居民工作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增添了他们不易察觉的网络隐患,尤其对受教育水平偏低的失地农民而言,他们对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难以精准辨别,容易上当受骗。此外,社区居民在社交平台相互谩骂诽谤、兼职刷单等网络越轨行为也时有发生,甚至,有部分青少年难以抵制网络色情、网络赌博的诱惑,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为此,L 社区秉持技术包容、数字治理的原则,以“数字综管”作为社区服务新形式,着力消除数字社会给不同人群带来的新技术区隔,让大家能够均等、安全、便捷、有尊严地享受智慧化社区服务,将刚性的城市管理与柔性的社会治理有机融合,架起人们生活世界中消弭数字鸿沟的服务桥梁,帮助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世界中较为顺利地实现在场的现实社会与缺场的网络社会的有机融合。

第一,开通多渠道云平台,开展数字服务,为居民数字赋能。L 社区所在的 C 县是国家级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之一。L 社区积极利用良好的政策环境,在 C 县网信部门的支持下,主动接入 C 县统一建设的数字乡村中心平台。该平台连接政务、经济、

文化等信息枢纽,极大地帮助 L 社区居民实现与外部环境的资源共享,并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公共媒体终端向社区居民及时发布各类服务信息。当前,L 社区拟建多个枢纽节点以及横向对接节点,可以据此实现“一枢纽多中心”的数字化治理,促进党建中心、政务中心、综治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和综合服务中心等多部门的信息联动和一体化服务,推进数字技术与社区治理的“无缝”链接。

第二,搭建电商平台,打造数字经济,扩展失地居民新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的 38.6%,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规模中占比已经超过 80%,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主阵地。<sup>②7</sup>在如 L 社区的过渡型社区里,为帮助失地农民开辟新的生产空间,应全面推进信息技术的生产性应用,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市场要素功能,扶持失地农民通过电商平台,拓宽其就业增收渠道。另外,还应积极利用数字媒介(抖音、快手、B 站等),凝聚社区共识,改造生活空间,助力社区治理朝着网络化、数字化、智慧化方向转型升级。

### 4.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文化包容策略

文化包容的治理方式主要是指积极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消弭文化空间的斥离,促进乡村优秀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的有机融合。文化冲突是过渡型社区无处不在的现实问题,也是社区治理中最难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成效的实务领域。人们的价值观念、认知结构、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风土人情、岁时礼俗等文化传统,往往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经由生计活动逐渐沉淀而成的稳定结构,再通过文化濡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时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特定区域的地方性文化(比如 L 社区居民原属的 28 个自然村所代表的文化生态)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资源;但是,一旦时空条件发生剧烈变化,原来的地方性文化由于难以适应新环境,就容易成为一种文化负资产而阻碍地方性社会走向文明和进步。文化因其具有相对稳固的结构而表现出顽强维系自身存续的韧性。在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乡之间人们生计方式的显著差异,必然导致过渡型社区文化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如何移风易俗,建立起适应都市文明的新型社区文

化,消弭文化空间的斥离,就成为影响过渡型社区治理成败的关键。对此,L社区在实践中采取文化包容的治理方式,特别注重重塑居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健康文明、活力有序的社会建设,最终取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sup>⑳</sup>例如,为积极化解过渡型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建设社区新文化,L社区以“北城大讲堂”为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的包容性文化治理行动,努力帮助居民自主实现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的有机融合,提升社区文化治理的服务水平,促使过渡型社区健康、文明、有序发展,进而适时构建新时代的公序良俗。<sup>㉑</sup>

概而言之,针对过渡型社区的空间“聚—离”现象,须多维施策,实行包容性治理。在价值和目标导向上,应以塑造社区“公共性”为要义,积极引导并改造居民的社区主体性;在治理体制机制层面上,要优化制度设计,激活多元主体的治理力量,夯实社会基础;在技术与行动层面上,须重视文化建设,并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使线上线下多元空间整合,增强居民参与能力,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过渡型社区治理新格局。诚如学者文军所言,包容性治理将使得城乡的重新整合成为可能,进而有助于促进“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活力”与“秩序”等多维度的深度联结。<sup>㉒</sup>

当前,我国正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快速迈进。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区,过渡型社区将伴随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乡空间关系的深刻变迁而阶段性地广泛存在。直面经验现实,分析空间变迁及文化嬗变对过渡型社区建设的深远影响,探索网络化背景下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理想类型”,这是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所需。空间分析是当代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视角,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空间关系。如果将过渡型社区治理置于城乡空间关系背景下予以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伴随着城郊乡村地区一系列空间关系的剧烈变迁,生活共同体内部的社会责任与公共权利发生了深度重构并引发社会冲突。本文所述L社区里呈现的空间“聚—离”悖论,即是其例。理论工作者与社区治理的实践者,均须因应过渡型社区的空间新变化,采取新视角,确立新思维,建构新路径,探索社区治理的新模式,以实现空间整合,践行空间正义,促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

#### 注释

- ①张兴杰:《提升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6日。②喻新安:《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7页。③纪芳:《过渡型社区的基层组织建设:实践类型与运作基础》,《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④徐宏宇:《转换角色与规范秩序:空间变革视角下过渡型社区治理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⑤[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5页。⑥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Neil Brenner, e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168.⑦David Harvey. *The Soci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005, Vol.18, No.3, pp.211-255.⑧Edward W. Soja.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18.⑨汪萍:《空间重组与社区重建:一项苏州工业园失地农民聚居区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页。⑩⑪数据来源于作者的实地调研。⑫王晓磊:《社会空间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32页。⑬吴宗友:《堪輿文化: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生态学》,《江淮论坛》2011年第1期。⑭参见访谈资料——“别提以前了,我家老房子(指先前居住的平房。括号内为笔者注,下同)可比现在新房大多了,说搬就搬,真是不习惯。原先老房子堂屋前有个大稻场,家里有事(指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在稻场搭个棚子就能放上三四张桌子;现在上楼了,晚上睡觉总是不踏实,谁家小孩哭闹,夫妻吵嘴只隔层楼都会听得清清楚楚……弄得我常常失眠到天亮。”(L社区居民Z,女,60岁)“在这里生活了快70年,自家老房子被拆了,田地全被征了……现在,新房住在顶楼(指五楼),闲的时候就和老伴站在阳台上朝着原来老房子那块地望着……(指着笔者说)先前我家老房子东侧有个池塘,小时候放完牛常坐在池塘边休息,你看看这一车又一车(指拆迁用的铲车)渣土,没几天就给填平了。”(L社区居民H,男,69岁)⑮[法]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刘北成、杨远婴译,2007年,第78页。⑯参见访谈资料——“那块地(指西侧二期规划建设土地)原来就是我们大田(村民组)的,现在还没开发,我想去种点蔬菜,而我家住在8号楼(L社区西南侧),和菜地只隔着一道围墙,如果从社区钻‘小门’(指被居民截断的围墙栏杆)去菜地可就方便多了!但是,社区保安非得要我从小门(L社区东北侧)出去,这样绕着社区走一大圈,你说我气不气!”(L社区居民S,女,55岁)⑰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1991, p.168.⑱参见访谈资料——“我们还算挺幸运的,抓阄(指摇号分房)分到8号楼,楼里我们同村人相对较多,所以平时晚上吃完饭没什么事干,几个同村的习惯拿上马扎在8号楼下面唠唠嗑,但与不是我们楼的其他同村人,见面机会变少了,渐渐也就陌生起来了。”(L社区居民J,女,57岁)⑲赵永琪、陶伟:《权力空间的研究进展:理论视角与研究主题》,《世界地理研究》2017年第4期。⑳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页。㉑参见访谈资料——“我(孙姓)是比较关心村委会投票的,当年我叔公(孙姓)是村支书。也不是图叔公帮我家啥忙,反正我叔公当村支书的那几年,我家和曹三家争村西口那块油菜地都差点动手了,后来叔公出面,那块地最后也就归我家了。”(L社区村“两委”成员J,男,30岁)㉒参见访谈资料——“我在社区附近工业园的玻璃厂上班,感觉太累了,一个月工资加上全勤奖一共才3000多块钱,而且像我们这些工厂基本没有节假日,请假就扣工资,



几乎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了。”(L 社区居民 M, 男, 48 岁)<sup>⑳</sup>参见访谈资料——“现在的购物方式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以前去集市赶集的时候, 买好了就回来了, 现在去北城(指都市近郊商业区)那边购物,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我和老公每次带孩子去, 逛逛商场, 给孩子买点新衣服, 再吃吃饭、看看电影啥的, 都要花上五六百块钱。”(L 社区个体经营户 Z, 女, 29 岁)“我们这里喜事(指结婚、生孩、考学、寿辰、乔迁等礼俗活动)现在都在北城那边办, 那边饭店也多, 比先前镇上的饭店更上档次, 菜品也更丰富, 但一桌饭不含酒水至少也要一千来块钱, 镇上才五六百呢!”(L 社区保安 Q, 男, 58 岁)<sup>㉑</sup>参见访谈资料——“我们家四口人, 大孩是女儿, 去年出嫁了; 小孩是儿子, 都 29 岁了, 还没成家呢! 能不着急嘛, 在农村这么大岁数了, 唉……不过也只能怪我和我家那位(指丈夫)不会忙钱, 之前儿子相亲了一个女孩, 都带回家住了两天, 说住不习惯就再也没来了。后来我问儿子, 儿子说我们早上起得太早, 在家里倒腾, 打扰他们休息了; 还有就是我们晚上去洗手间, 为了节约用水, 要等到早上再冲马桶。我们这些生活习惯和年轻人住一起还是不行啊!”(L 社区居民 Y, 女, 58 岁)<sup>㉒</sup>陈炎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兼谈学

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体会》,《中国经贸导刊》2017 年第 34 期。<sup>㉓</sup>刘少杰:《网络社会的结构变迁与演化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第 87 页。<sup>㉔</sup>杨梦洁:《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现状、机制与策略研究》,《中州学刊》2021 年第 9 期。<sup>㉕</sup>吴理财:《论活力社会建设》,《长白学刊》2022 年第 1 期。<sup>㉖</sup>“北城大讲堂”是由 S 镇政府主办、L 社区协办的城乡社区治理大型系列讲座。近年来, 该讲堂已经邀请了十多位社区治理方面的专家组成智库, 通过分层分类、有针对性的主题演讲和研讨, 面向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社会组织成员、居民志愿者骨干、普通居民等公开授课。以 2020 年下半年授课内容为例, 专家们分别从时空重组背景下的社区治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建设、5G 时代社会风险预警和管控、社区矛盾调解技巧、符号消费和社会心理、职场环境与心理健康、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治理等方面开展了接地气的专题讲座, 为基层社区的文化治理引入智力支持, 注入新活力。<sup>㉗</sup>文军、王云龙:《寓活力于秩序: 包容性城市治理的制度建构及其反思》,《学术研究》2020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 翊 明

## Spatial "Convergence VS Separation" and Inclusive Governance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Wu Zongyou Ding Ji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have emerged in China. Their "transition" has brought about the tension of "convergence and separation" in multi-dimensional space,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spatial convergence of "moving from villages and land" and the spatial alienation of community identity, the settlement justice of "lottery and house distribution" and the separation of social space,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on space and the dispersion of consumption space, the cohesion of living space and the exclusion of cultural spa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special contradictions of such commun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inclusive governance, that is, to carry out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with the main contents of subject tolerance, system tolerance, technology tolerance and cultural tolerance,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eliminate the spatial tension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depth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power space, system space, social space and cultural space, and then realize the ideal picture of "good governance"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Key words:** transitional community; space tension; spatial reorganization; inclusive governance